

※柳存仁先生紀念專輯※

民國時期學術研究的活字典 ——柳存仁先生專訪

林慶彰 * 採訪 張晏瑞 ** 整理

在春寒將屆，乍暖還寒的二〇〇七年四月天的午後，林慶彰師領著我與袁明嶸同學前往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的咖啡廳，對從澳洲遠道而來的柳存仁先生做訪談。能與這位國學泰斗，也是民國時期學術研究的活字典見面，對我們兩位從事民國時期學術研究的學生來說，心裏懷著一股興奮。

柳先生一九一七年生於北京，是英國倫敦大學文學博士、哲學博士，也是韓國嶺南大學、香港大學、澳大利亞默德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。一九六二年起，應邀前往澳洲講學，歷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、教授、系主任、亞洲學院院長、大學研究員、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。以道教文學、俗文學、小說研究，享譽學術界。

這次柳先生來臺，是由成功大學法鼓人文講座邀請，在林慶彰師的促請下，應允來臺。先到文哲所，再前往成大。同時，也發表四場學術講演，文哲所一場，成大三場。近年，林慶彰師研治民國時期學術，陸續整理了柳先生的著作，編有柳先生的著作目錄，為了詳實與補遺，做了這次的會面。也在多方善因緣的匯聚之下，展開這次的訪問。

一、中學時期

(一) 東吳二中的就學經過

柳先生十三歲時，在廣州中山大學附中初中一年級就讀。當時，柳先生的父親

* 林慶彰，本所研究員。

** 張晏瑞，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碩士。

在上海做事，柳先生和母親為了和父親團聚，便從廣州搭船前往上海。民國十九年(1930)時，進入東吳二中就讀。

東吳二中與今天的東吳大學有相當的淵源。當時，東吳大學至少有兩個分校，一個在蘇州，一個在上海。柳先生的印象中似乎還有一個分校，但已經沒有什麼記憶了。柳先生所就讀的東吳二中，是東吳大學上海分校的第二附屬中學，校址在上海虹口區的昆山路。虹口區是上海公共租界裏的一個區，那個區域裏有很多日本舖子。當時，上海有一條主要道路，叫作「北四川路」。有很多橫的小路與北四川路交會，其中一條就是昆山路。昆山上有一棟四層樓的建築，就是東吳二中。一九三〇年，日本人攻打上海時，這個學校就被毀掉，即使沒有被毀掉，也無法再使用了。

柳先生進入東吳二中就讀，是透過熟人的介紹，沒有經過考試，便入學就讀。入學後，還是從初中一年級開始讀起。當時，柳先生剛到上海，在語言方面還不能適應。東吳二中的教員大多說江浙話，很少說普通話的。柳先生在二中學習，家住上海，加上同學都是江浙人，大概一年多就熟悉上海話了（這裏所謂的上海話，指的是上海通用的語言）。柳先生說，當時的上海是公共租界，是很熱鬧的一個城市，有寧波人、浙江人、江蘇人、廣東人、北方人，全國各地的各種人都有；真正的上海話，受各地方口音的影響，產生了音變，等於已經沒有了。當時東吳二中所聘請的教師，也是來自全國各地。除了英文課程以外，其餘都用漢文教學，但是老師的語言並不統一，有的是浙江人，有的是廣東人。

東吳大學有一所法學院，位在東吳二中教學大樓旁邊的一棟房子。法學院對面還有一個很大的教堂，那個教堂是研究中國十九世紀以後，也就是鴉片戰爭以後，洋人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影響的一個很著名的教堂。東吳大學的法學系是專門訓練學生作律師的，是很有名的一個學校。因此，東吳二中和其他中學比起來，是一所很特別的學校，它特別重視口才訓練，要求學生必須練習講演。因此，每個星期五一定有學生的講演比賽，每一個人人都必須輪流上臺講演。即使當時說話說得不是很標準，也必須上臺練習。如果對講演有興趣的同學，就能夠藉由講演比賽的訓練，鍛鍊出好口才。

在當時的學生中，有一個比柳先生大好幾屆的同學，在中國話劇史上很著名，叫作袁家萊，他是中國話劇表演上很有名的人；每次放假，他會跟別人到南京或別的地方去演戲。還有一個叫蔣蔭恩，他是後來《大公報》在桂林的總編輯。像這類

有本領的同學很多，同學之中多的是這一類社會上大家都知道的公眾人物。

東吳二中是一所男校，沒有招收女學生，門禁管制很嚴格。該校提供有宿舍，住宿的人一個禮拜可以回家一次，柳先生因為家住上海，因此每天通學。學校的大門，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，平常並不開啟，進出都要經過一個小門。小門有個門房，學生們很怕門房的管理員，因為他不讓學生出去，學生就出不去了，這點在當時很有趣。

這個學校柳先生才念三年左右不到，就遇上戰爭了。當時，換了一個學校，叫作華僑中學，後來又轉入光華附中，並在此畢業。

（二）喜歡閱讀的作品

有報導指出柳先生在中學時就很喜歡讀魯迅、周作人、葉聖陶、老舍他們的作品，也曾經在《論語》、《人間世》寫文章。柳先生澄清並沒有在《論語》寫過文章，但是在《宇宙風》寫過文章，《宇宙風》是比《論語》晚一點發行的雜誌，是用本名發表的。雖然曾在《人間世》投過稿，但是次數不多，只有一次，是翻譯《詩經》的一兩首詩，大概是用與「存仁」音近的筆名發表。

對於魯迅等人的作品，柳先生說他喜歡讀的原因，就是喜歡讀些不許讀的東西。由於柳先生的父親並不太了解這些作品，也不常看那些雜誌，並不會禁止。加上，柳老先生有個年輕的朋友，是同事的兒子，算是個晚輩。他有些新的雜誌，為柳先生的閱讀，提供了作品的來源。當時魯迅和郁達夫兩個人編了一本雜誌叫作《奔流》，裏面登過林語堂先生寫的〈子見南子〉一文。柳先生回憶當時林語堂和魯迅他們那些人的感情都很好，只是後來彼此意見不合，就疏遠了許多。

當時，林語堂先生的文章是談孔子遇見南子的故事。後來，山東省政府有個中學校長叫作宋還吾，他把這篇文章當作劇本拿去演戲。登臺表演之後，孔子後代有人不高興，認為這齣戲侮辱了孔子，打了官司。雖然不是針對雜誌這篇文章，主要是控告那部上演的戲劇，後來那位校長免了職，這篇文章也算是惹了麻煩。柳先生跟林語堂認識，就是透過這種關係認識的。柳先生也認識林語堂先生的哥哥林憾廬，也是從事雜誌編輯的。柳先生直誇他是一個很好、很剛直的人。柳先生跟林語堂先生最後一次見面，是一九五八年在香港；當年林先生從美國回香港，很想念柳先生，所以碰了面。林語堂所寫的散文，柳先生很喜歡，雖然有些人很不贊成，但柳先生認為各人喜好不同，無所謂對錯。林語堂先生在臺灣有一個紀念館，在仰德

大道，是他的故居，柳先生並未去過，但去過附近的張大千紀念館。林語堂先生曾經在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教過書，因此在廈門大學圖書館也有個紀念室。對於魯迅受邀到廈門大學教書，柳先生認為可能跟林語堂先生的推薦有關係，因為他認識廈門大學的校長林文慶。

（三）對普通話教學的看法

柳先生從學習上海話的這段過程中，體認到對於普通話的教學，有人主張規定每星期教多少堂課，柳先生認為這樣的方法效果不佳。柳先生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請大陸、臺灣……等各地的人到當地教書。雖然教書的人會受到口音的影響，不見得能說標準的普通話。但是學生跟老師在一起學習，普通話中有什麼詞彙，學生多少都能夠了解。加上教師當中也有教物理、數學等學科的，這些學問和語言的關係不大，只要能夠了解其中的道理，以及使用的名稱、單位，就可以了解這些學問。如果學生能夠跟著這些老師學習個幾年，對於普通話的學習一定有很好的效果。如果專門請一個老師教授普通話，每星期只講授兩堂課，每次都念一篇課文，這樣的教學成效必然會受到許多限制。柳先生認為，今天香港就是沒有請多一點說普通話的人去擔任教職，因此整個香港還是以廣東話作為通行的語言。而外地人來到香港，反倒學會說廣東話了，因為在這個地方，他不學廣東話，他聽不懂別人說的話，他在服務機關裏頭就無法工作了。因此，柳先生認為營造普通話的語言學習環境，對普通話的教學會有較好的效果。

二、大學時期

（一）考取北大

柳先生光華附中畢業後，考取北京大學。當時北大的入學考試是在上海參加的。考試的作文須用毛筆書寫，文體不拘白話文、文言文。北京大學是分系錄取學生的，柳先生投考的是國文系，該系在當時就已經叫國文系。投考北大的原因，主要是柳先生小時候在北平長大，離開北平多年後，很想念在北平的日子，希望能夠藉著考取北大這個機會，離開上海，回到北平。當時柳先生參加三所大學的考試，考取兩所。北大當時在上海只錄取八個人，柳先生便是八個人之一。當年同榜考取的，還有容庚的女兒容媛。柳先生說：「有時候考試會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，答題

時一方面要看答案合不合閱卷者的需要，同時也有應答技術上的考量。考試的範圍包含各學科，從國文到物理及數學都有。」柳先生自謙當時也不知怎麼地就進入了前八名。

（二）就學經過

柳先生進北大讀了兩年，就遇上戰爭。之後兩年，柳先生在上海的大學寄讀。因為在上海讀了兩年大學，所以柳先生有機會認識呂思勉先生、蔣維喬先生，也認識光華大學的校長，還認識了許多後來的朋友。但柳先生心裏頭最滿意、最喜歡的學校，還是北京大學。

柳先生常常在《宇宙風》雜誌上，撰寫許多有關北京大學的事情，以及在北大許多有趣味的故事。一九九八年，北大一百周年紀念時，出版了一本紀念專輯，裏頭便刊錄了柳先生當年的文章。那些文章很受到人們喜歡，柳先生謙稱是年輕時候寫的散文，不是學術性的文章，加上記錄北大許多特別的事情，因此喜歡的人較多。柳先生曾經在文章中記錄過錢穆先生，談到在柳先生學生時期，錢穆先生並不十分有名。錢穆先生是江蘇無錫人，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主要是北方人，其中包括東三省下來的學生，還包括甘肅、山西、陝西、內蒙古、察哈爾、綏遠這些省分的人，在校園中多說方言。因此，錢穆先生說話的口音，對當時的學生們來說，聽起來是有點吃力的。

（三）師友學習

柳先生求學北大時期，當時的文學院院長是胡適先生，同時也是系主任，也是授課教師，教授文學史。

老師當中，有一位鄭奠先生，是浙江諸暨人，主要是專攻訓詁之類的學問，同時也是蔣夢麟的表弟。當時，蔣夢麟是個留學生，也是北大的校長，又做過中國的教育總長，後來在臺北又擔任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負責人。柳先生對於蔣夢麟先生的《西潮》一書，十分地推崇，認為這本書很值得一讀。同時，也對蔣夢麟先生的節操氣度很欣賞，因為當時有人批評鄭奠先生在北大教書，是依靠蔣夢麟的親戚關係。柳先生認為，蔣先生並沒有受到這些流言的影響。柳先生還告訴我們，即使知道一個人有親戚關係，也可以跟他作同事的，並不一定親戚關係就是私人關係；如果他學問不好，那才是私人關係，如果有好的學問，就算是私人關係

也可以延攬的。對於鄭奠先生教的功課，柳先生覺得很特別，那是一門叫作「古書導讀」的課程。現在這個名稱用得很多，但在當時並沒有什麼人開這門課。這門課程講的是「如何念什麼書」的學問。柳先生說，鄭先生教這門課的稿本相當多，有七百多種，而且都是用毛筆書寫，全部堆著讓學生自行翻閱。柳先生認為，鄭先生是個很老實，而且規規矩矩做學問的人，所以柳先生特別提了鄭先生的故事。

此外，還有羅常培。羅先生是滿洲人，專攻語言、文字，尤其是在語言方面的學問。「羅」姓是滿洲人的貴族，「愛新覺羅」的意思。柳先生說羅先生是個「覺羅」，在清朝「覺羅」是皇親貴族，柳先生說，現在沒有皇帝了，所以不能體會那種皇室厲害的情形。當時羅先生是皇家的人，有一點基本的背景，背後有人支持他。到了民國，不太有人用覺羅這個說法了，所以就改姓羅。羅先生跟老舍是同學，而且都是小學時候的同學。當時社會環境不佳，百姓都很窮。雖然羅先生是個覺羅，但日子也過得不好。因為民國政府原先答應每年給清朝的皇室一年幾百萬的錢，只給了第一年，之後大概就再也沒給過了。所以清皇室只得賣古董、賣故宮裏面的東西維生，覺羅也就因此窮了。寫小說的老舍跟羅先生很好，有次老舍到北京大學演講，當時，老舍已經是著名小說家了，來聽的人多得不得了，連窗外邊都擠滿了人，好像來了個明星般。他們二人可以說是北京裏頭的北京，都能說最地道的北京土話，聽他二人說話，就像到北京裏頭去聽變戲法的、說相聲的，很多東西聽起來很好玩，也很好笑，但也有些地方聽不懂。當時，胡適先生是系主任，又是文學院院長，羅先生只是普通的教員、教授。但是，要是胡適先生出差，羅先生就是代理系主任。

與柳先生較相熟的老師，還有一位鄭天挺先生，福建人，是歷史系的教授，幾年前還在世。鄭先生跟柳先生挺好，曾經要求柳先生協助參與一兩個研究活動。因為這些研究活動的關係，柳先生寫過清朝一位學者俞正燮（即俞理初）的年譜。此外，鄭先生還教柳先生整理清朝十九、二十世紀時的歷史地理學者張石洲（也就是張穆）的事情，因此柳先生對顧亭林他們的事蹟有一點認識，同時也去過他們的廟。柳先生在北京的時候，還有紀念他們這些人的廟宇，後來解放以後，那些廟宇差不多都毀壞了。在柳先生畢業之後，就沒再見過鄭先生，直到一九八〇年鄭先生在南開大學作校長時，他邀請了柳先生去參加一場明清時期的學術討論會，才在天津再度碰面。鄭先生一看見柳先生，就緊緊地將他抱住，柳先生說他從來沒有過抱學生的行為，可見鄭先生對柳先生的師生情感之深。

對柳先生比較有影響的老師，還有孫楷第先生。孫先生是河北省滄州人，他有著一口滄州口音。雖然，孫先生跟別的老師一樣教書，但是他真正的職務是北京圖書館裏的編輯。孫先生寫過許多有名的小說書目，如：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、《東京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這一類的書。柳先生受其影響，到了英國之後，也寫了《倫敦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，內容收錄了許多孫先生書裏頭所沒有收錄的資料。這本書不僅在臺灣有翻版，在大陸也有重印的本子。

柳先生所喜歡的老師當中，有一二位是享有盛名，且上課的學生特別多的，但是也有些是選課的人特別少，也許一堂課不到五個人上課的。由於孫先生研究的是小說書目，因此那堂課十分枯燥，加上孫先生操著一口滄州口音，講課也不太有趣，口才也不太好，因此修課的人很少。可是柳先生欣賞他寫的文章，也欣賞他出的書，覺得他寫的東西很謹慎，不容易挑出錯誤，是個值得佩服的人。柳先生畢業之後，一直和孫先生保持通信，之後凡是孫先生編了書目，也都寄給柳先生一份。在解放之後，柳先生還陸續收到孫先生出版的書，但人就沒見過了。

其他老師中，柳先生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有兩位可以提，其中一位是周作人。周先生是柳先生後來很佩服的一個人，這是就柳先生個人印象來說的，跟當時上課沒有什麼關係。柳先生上周先生課的時候，只有十九歲、二十歲，年紀還小。加上周先生的聲音很低，而且講的東西，如果沒有若干基礎的了解，就不容易捉住他的要點。但是他名氣很大，來上他課的人很多，但往往就是第一堂課人多，第二堂就沒有多少人了。比起那些講話聲音很高，而且一講學生就知道要說的是什麼，也知道他說的跟你想要聽的是很有關係的那種老師，如：胡適先生，是不相同的。

雖然胡適先生講課很受學生歡迎，但是當時學生最佩服的還是共產黨，不是胡先生。即使胡先生在當時有他的國際地位，有他的名氣，有政府的支持，有他的一套背景，加上他對學生也很好。但是他不容易把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完全說出來，他希望當時的政府成為一個像樣的政府，但是在說話上，他要擔心許多顧忌。如果像共產黨一樣大罵政府，很容易就能得到學生的歡迎。當時學生的生活很辛苦，從東北到北京之後，沒有衣服，也沒有錢，一大群人住在宿舍裏，全身的衣服都是臭的。當時住宿舍是免費的，只有吃飯要另外自己付費。那時候的學生大多穿一件深顏色的衣服，特別是黑的，或是藍色的，主要是北方天冷，再者就是因為窮的關係，所以他們的衣服從來都不洗的。

在這個時期，北京大學雖然窮，但是圖書館是很好的，可以說是那時候很有名

的圖書館。同時，授課教師也是很好的，所以一直到現在，北京大學依然是學術界的重鎮。柳先生在這個環境下學習，在學問上所受的影響，柳先生自己認為可以說是一種雜學，而不是專家之學。柳先生認為，專家之學應該只做一門學問，而他自己做了各種的學問，所以有點可以借用古人所說的「雜家」這種字眼，來形容自己的學問。柳先生認為這樣子的學習，對學問的追求不會有不好的影響。有些學問做久了，也就是很專門的學問，原本看來毫無關係的學問，也都會產生關係。所以廣泛的學習，是可以讓研究者看見其間關係的。

（四）軍事訓練

在那個動亂的年代，北大學生的腦海裏，人人都想念自己的家鄉，同時又受到陝北、延安共產黨動亂的影響，因此在大學課程中，都有一門軍事訓練的課程，柳先生也參與過這樣的課程。

當時，統治中國有好幾個政權，北京大學在當時是由國民政府所管轄，但是當時占領北平的政權並不是蔣介石的系統。蔣介石的系統在一開始打了幾次敗仗後，就無法進入北平了。當時統治北平的軍閥是所謂的西北軍，西北軍的首腦是宋哲元，曾是馮玉祥的部下。當時馮玉祥不被蔣介石喜歡，失去了兵權，馮玉祥的部將就各自據地為王，那時候占領北平的就是宋哲元。當時北平的政治環境是這樣地複雜，可是學校並沒有停課，還在這種環境下度過一年。其中較特別的是，那時候的學生受南京政府的命令，還可以有軍事訓練的課程，這點總是讓人覺得特別奇怪。當時軍閥已經對學生的行為做出許多限制，但是還允許學校開辦軍事訓練課程，這一點有異於常理。

軍事訓練的課程開在大學二年級，因此各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都必須集中到一個地方做軍事訓練。原先的時間是三個月，但由於訓練的地點十分危險，所以改為一個月。由於柳先生受過一個月的軍事訓練，因此認識了很多別的學校的學生。

軍事訓練的內容跟真正的軍隊是一樣的，除了伙食很糟之外，還要背一把槍。柳先生回憶那把槍大概重八斤，還算是一把新槍。當時，負責訓練的教官不知道從哪個地方調來的，操著一口奇特的口音。訓練單位的最高負責人是一個二十九軍的旅長，姓何，大概叫做「何機風」，後來在內戰的時候，變成共產黨的軍隊。那時候高級的軍官，蔣介石都送了一把劍，表示「你是我的好部下」的意思。後來，人人都想對領導者輸誠，都想做個好部下，所以每個軍官都弄了一把劍，結果後來大

家都有一把劍。柳先生提到，有次學生們可能因為功課太累，或是伙食太差之類的原因鬧事。那位旅長就把學生們訓斥一頓，還把自己的劍解下來，表示因為學生們胡鬧，是他失職，不配當好部下，必須接受處罰，因此不能佩劍一個禮拜。由於發生這件事情，因此在學生的心裏，這個人還占有一點地位，覺得他還像是個軍人。

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在軍事訓練期間，訓練單位會邀請著名的學者來演講，其中包括胡適先生。當時聽演講的學生有北大的，有清華的，有燕京的，起碼有八九個大學的學生，全穿了軍裝，全都土頭土腦的樣子，所以胡先生來演講時，所有的學生都不認得了。

（五）主辦刊物

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後，柳先生回到上海，在光華大學寄讀。當時柳先生在一個朋友的介紹下，在美國人辦的《大美晚報》上主編過《文史》這個專欄，就像現在在《聯合報》主持一個專欄一樣。當時柳先生找了一些北大的人來寫文章，曾經參與過的，有呂思勉……等人。後來因為報紙停刊的關係，所以專欄刊行的時間並沒有很長。當時柳先生自己擔任主編，同時也給專欄寫文章。柳先生曾經寫過一篇〈為大學生進一言〉（或作〈為文科大學生進一言〉）的文章，主旨是說文科有文科的需要，讀文科還是有用的，文科的學生還是可以謀生的。

三、追求學問的道路

（一）大學畢業之後

一九三九年柳先生大學畢業後，曾經在光華大學擔任過一年的教職。後來由於結婚的關係，離開大陸到香港。原先柳先生想到別的地方，不是要到香港。只是到了香港之後，因為親友的關係，在香港住了一年多，就沒有前往原先要去的地方。那一年，柳先生在就在香港政府做事。

（二）留學夢想的追求

在香港政府做事期間，柳先生對出國念書有著極高的意願。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柳先生著作：《上古秦漢文學史》第一版的序文中便提到，柳先生當時想出國念書的想法。當時柳先生希望透過外文來了解外國人如何研究中國的學問，不論是歐

洲或是美國，他希望了解外國採用的是怎樣的研究方法，如何知道中國學問的好處。當年初版時的序文，現在已經沒有印在書上了。林語堂先生曾經幫柳先生寫了十一個學校的介紹信，可惜都沒有錄取。雖然當時沒有錄取，但是出國留學的念頭還是一直存在柳先生的心中。

當時英國學位制度規定，若要投考博士學位，必須先取得英國大學的文學士資格。一九五四年，柳先生在香港取得了倫敦大學的學士學位，這個學位取得的方式十分特別。倫敦大學每年委託香港的教育司衙門舉辦學位考試，由倫敦大學郵寄該校四年級各個學科的考試題目到香港。在香港的考生，即使沒有讀過倫敦大學的教科書，沒有到倫敦大學上過課，只要知道倫敦大學的學術方向和內容，憑著自己學習，即便自學的效果沒有臨場學習來得好，但只要能通過考試，就能取得倫敦大學的學位。柳先生通過這種學位考試，取得了倫敦大學文學士的學位。不僅當時工作的收入因此提高，更讓自己對學問的興趣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。到了一九五七年，柳先生前往英國取得博士學位。有報導指稱一九五七年柳先生前往英國念書，事實上不是去念書，而是去英國參加博士學位的考試。

（三）博士論文撰寫的過程

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，柳先生與英國學者的交流並不多。其中有一位韋利先生 (Arthur David Waley, 1889-1966)，他翻譯過許多中國的書籍，是英國最有名的學者，其餘的就是論文的指導教授。

當柳先生開始撰寫論文時，並沒有指導教授。恰巧有位倫敦大學教授漢文的女教授，叫作愛魯爾斯。她經新加坡，再到香港，到了香港大學，認識了柳先生，柳先生給她看了論文的初稿，請她指導論文。後來那位女教授退休了，便改由倫敦大學的大教授西蒙先生 (Ernest Julius Walter Simon, 1893-1981) 指導柳先生。

原先柳先生的博士論文是要做一本分析中國漢字的字典，當時柳先生所依據的理論是「形聲字聲符兼義說」，認為中國字的聲符與形符一樣，都是帶有意思的。這個理論不是柳先生所創發的，而是宋朝王聖美所傳下來的理論。但是歷代以來，這派理論的書都亡佚了，柳先生要做的就是一本有關這個理論的字典。後來，西蒙先生告訴柳先生沒有人可以指導這個题目的論文，也就是不能接受柳先生做這個題目，柳先生就改做小說史的題目。這個題目翻成中文叫作「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」，後來在德國出版，出版時的序言，正是韋利先生所執筆的。

英國的學制規定，要通過博士論文的學位考試，一定要到英國。當時柳先生的父親在香港，已經七十多歲，柳先生不願意離開父親。自柳先生離開上海之後，便與柳老先生相依為命，父子感情相當深厚。一直到柳老先生故去之後，柳先生才覺得自己可以多一點活動，才前往英國完成論文。到了英國之後，倫敦大學希望延攬柳先生擔任三年的客座教授。當時柳先生在香港有穩定的工作，也有其他答應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沒有接受倫敦大學的邀請。

四、澳洲講學

一九六二年，澳洲國立大學邀請柳先生前往講學，柳先生應聘前往。到一九八二年底，累計教書年資滿二十年，才離開澳大。柳先生到澳洲講學的相關報導，有些有誤。柳先生一九四〇年到香港，一九四九年才開始在香港教書，曾經講學的學校有三個，一個接一個，到了一九六二年才到澳洲教書。

（一）學校概況

在柳先生前往講學之前，澳洲國立大學是墨爾本大學的一個分校。墨爾本大學的校址在墨爾本，當時有個分校在坎培拉，最初叫作坎培拉學院，後來獨立成大學，也就是澳洲國立大學。其中，有個學院叫作亞洲學院，就是柳先生講學的學院，有院長、教授、講師這一類的教職。亞洲學院裏頭有個中文系，現在中文系的教授，正是當年柳先生的學生。

柳先生執教的時候亞洲學院有五個系，這五個系一個是東方文明系，做的是歷史的研究；一個是中文系，做的是漢語或者古典文學、現代文學的研究；還有日文系；還有印尼系，主要研究馬來、印尼、回教、阿拉伯，共四種語言；最後是佛教語言系，研究梵文、印度文。每個系都有個教授，有幾個講師，也有助教。柳先生應聘前往澳洲時，中文系的教授是著名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，他是高本漢的學生。當時系上的教師有幾個教中文，還有幾個教通識課程。

（二）研究動向

到澳洲國立大學可以說是柳先生真正研究道教的開始。由於柳先生的興趣在中國小說的研究，因此對於宗教的問題會有所關涉，可見柳先生對於道教相關問題的

關注可以追溯到撰寫博士論文之前。長期地研究下來，與佛、道教研究有關的問題，也都有了深入的研究。過去柳先生替《通報》寫文章，第一篇就是談到孫悟空的論文，主要的看法是印度的猴子，到中國轉變成孫悟空的經過。

在澳洲國立大學，柳先生曾經擔任過系主任，也擔任過亞洲學院的院長，後來更獲選為澳洲人文科學院的院士，學術地位很高。對於澳洲人文科學院的性質跟中央研究院相比，柳先生認為中央研究院的性質跟德國、歐洲的研究院較接近。與澳洲人文科學院不同的是，澳洲人文科學院是一個選舉的單位，負責從各學校或學院中遴選研究人員，譬如：澳洲人文科學院有一百五十個研究員，這些研究員都是在各個學校裏面，或各個學院裏面做研究。選舉時，透過審查論文、著作的手續，再經由秘密投票的方式遴選出來。研究人員一年開會一次，會議中決定研究院的各種活動。會議的地點選擇在澳洲的幾個大城市，輪流開會。因此，澳洲人文科學院不一定會有研究大樓，即使有研究大樓，也是提供辦事人員辦公，而不是提供給研究人員研究用的。

（三）培育優秀的華人學者

柳先生澳洲講學二十年期間，培育過一些優秀的華人學者，譬如：李焯然先生，以及現在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的蘇基朗先生，均是澳洲國立大學畢業的學生。柳先生對學生十分地關心，例如：對蘇先生的近況和家庭十分了解，同時對蘇先生在中國歷史上，元明之際福建、泉州相關論題的研究，也十分地欣賞。

對於目前外國學生學習華文的熱潮，柳先生認為，外國學生學習中文，就如同中國人學外文一樣，從完全不會開始，一定需要幾年的時間，才能夠精通。譬如：華人去日本學日文，也不能去幾個月就說學會了。如果短時間就自稱學成了，實際使用起來，就會感受到學藝不精。柳先生舉了清朝末年中國人到日本學法政的例子，當時號稱一上船就會日文，在日本三個月就可以學成歸國。柳先生認為是否真的這樣就能夠回國，回國以後能有什麼貢獻，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。對於外國人學習華文，柳先生也是抱持著相同的看法。

五、認為二十一世紀是漢學的時代

去年柳先生參加饒宗頤先生九十歲生日的慶祝會。在慶祝會的開幕典禮上，柳

先生做了一個賀詞讚美饒先生，賀詞中提到二十一世紀是漢學的時代的看法。對於二十一世紀是漢學的時代的看法，經過記者報導之後，獲得廣大的迴響。

對於這個看法，柳先生不能夠肯定今天中國政府的作為是否能夠支持自己的看法。柳先生從近幾十年中國的歷史來看，如果有不幸的事情，往往是接二連三地發生，幸運的事情縱然偶有發生，但總比不上不幸的多。柳先生長年旅居海外，但心裏卻十分關心中國。他提到國外有個情形，以報紙來說，如果中國今天發明一個很厲害的武器，或者是什麼好事情，在香港的報紙一定字大如斗地報導；臺灣報紙標題也一定很醒目，但是澳洲的報紙就只會有一小塊。反觀，如果中國有個人做了糊塗的小事情，明天澳洲的報紙可能就用斗大的篇幅來報導。可見華人在國外所處的地位，是十分難堪的。如果要讓海外的中國人所受的待遇像樣一點，一定要中華民族本身強大起來，老百姓能夠過著舒服的日子，才能夠讓二十一世紀成為漢學的時代，不然每次的機會都會失去的。

由於柳先生旅居海外多年，對於華人在國外的處境感受很深，對於二十一世紀是漢學的時代這個看法，可以說是柳先生對中華民族的一個期待。柳先生還提到最近看電視報導，內容是說中國再十年就可以趕上日本。柳先生認為中國現在最需要解決的，是從袁世凱開始產生為了個人的私利，或者是部分人的私利，或者為了其他的原因，而對問題有很多不同的意見，或是不同的身分、地位，就說了不同的話，不肯將事情踏實、平實地解決的問題。而不是什麼時候趕上日本，就算今天趕上日本，也不是值得稀奇的。從柳先生對中華民族的期待中，可見柳先生早已診斷出近代以來中國的病因，要使漢學時代真正地來臨，必須靠全華人共同的努力。

午後的訪問，從兩點到五點，三個小時的時間，柳先生仍然談興甚濃。在林慶彰師的體貼下，結束了這次的訪問。而柳先生的談吐和風範，卻持續地留在我們的心裏。柳先生結束成大的講演之後，隨即前往香港和大陸參與研討會。我們到桃園機場送機時，柳先生堅持自己提行李，堅持不願給別人添麻煩，不禁使我們驚訝柳先生的體力，更佩服柳先生的風範。在等待通關的同時，柳先生與我們談了許多，從言談當中可以看見柳先生的樸實與智慧，讓我們對這位學術界「宗師級」的人物更加地景仰。離開航站大廈，看著起飛的飛機，不禁覺得當天的天空特別地晴朗。